

程志敏 著

历史中的修辞

——从荷马史诗到两汉经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程志敏 著

历史中的修辞

——从荷马史诗到两汉经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中的修辞 / 程志敏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
(六点学术)

ISBN 978-7-5617-9038-0

I. ①历… II. ①程… III. ①政治哲学—哲学史—世界
IV. ①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5709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六点学术

历史中的修辞

程志敏 著

责任编辑 万 骏
封面设计 董 贻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
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038-0/B·673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奥克阿诺斯的不绝源泉 / 1

附录：批评文选 / 16

从神话到哲学 / 30

什么是智慧 / 50

附释：无谓的智慧 / 65

历史中的修辞 / 73

《厄庇诺米斯》的真伪 / 110

中世纪研究的危险 / 153

阿尔法拉比与亚里士多德 / 160

阿尔法拉比的修辞 / 175

两汉“今古文之争”浅解 / 206

作为政治哲学的解释学 / 219

附释：文字与解释 / 246

朱王相契论 / 255

后记 / 273

奥克阿诺斯的不绝源泉

荷马(Homer)的生平一直是西方争论的话题,现代人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存在荷马这个人。荷马本人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自传”,后人往往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描写的“歌手”来推想荷马的身份和地位,把他想像成一个四处流浪、靠演唱上古神话传说为生的盲诗人。但也有人从史诗的精妙描写、乐观态度、高贵精神和时代需求中,推断出荷马非凡的社会地位:荷马于公元前八世纪上半叶出生在小亚细亚伊奥尼亚地区某个海岛或海滨城市的钟鸣鼎食之家,祖上可能是从希腊中土(迈锡尼)移民过来的贵胄后裔。荷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传承着文明大统),喜欢听南来北往的水手、商贾和歌手讲述各种奇闻轶事,尔后周游地中海世界,广泛采风,收集、整理并创作了不朽的诗篇,引发了伟大的希腊文明的昌盛之机。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合称为荷马史诗,是荷马的主要作品。但自古以来人们也把很多“无主”的作品归在了荷马名下,这些作品大多也是用六音步英雄格写成。其中直接冠以荷马之名的就是一系列歌唱希腊神明的“颂诗”,现存 33 篇,长短不一,多有残缺。这些颂诗虽然在文学价值上无法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比,但对我们理解那个时候的文明形式不无裨益,可惜我国至今无人问津。此外,有人也把古代与荷马史诗相关的其他史诗,比如“英雄诗系”(epic cycle)中的《塞浦路亚》(*Cypria*)等作品视为荷马所作。这些作品即便

不是出自荷马之手,也与荷马史诗渊源甚深。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共约两万八千行,各分为二十四卷,分别讲述特洛伊战争以及战后奥德修斯的归返历程。描写豪气干云、金戈铁马战争场面的宏伟史诗《伊利亚特》成于荷马“生机勃勃的鼎盛之年”,而沉稳老到、如歌如诉的《奥德赛》则是荷马老年时所作(朗吉努斯《论崇高》9.13.1—4)。两部史诗在语言风格、写作手法、内在结构和生活理念上完全一致,两者“都有着世界性的深度,都试图在它们的体系中引入大量的特洛伊神话,而又不直接纠缠于情节中;两者都是复杂的、里程碑式的和回顾性的;两者在雅典艺术方法上有着巨大的共性,生动、明晰和微妙……这些基本的相似性指向相似的诗学关怀和相似的创作时间”。^①

荷马史诗几千年的流传过程就是它被人们诵读、理解、解释、摹仿、借用和批评的研究历程。“荷马史诗的研究当然不是从亚历山大里亚的建立才开始的。颂诗人、智术师(sophist,旧译‘智者’)和教师们在阐释荷马方面,老早就有着专业的兴趣”。^②可以说荷马史诗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人们对它源远流长的研修历史。

荷马史诗的研究历程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为第一阶段,可以称为古典时期;从公元前三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到公元12世纪为第二阶段,可称为中古时期;从中世纪晚期到1795年沃尔夫发表其著名的《荷马史诗导论》时为第三阶段,可称为近代时期;1795年至今为第四阶段,荷马史诗研究的现代时期。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学术史把公元529年优士丁尼皇帝关闭雅典学院作为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古典时期(classical antiquity)的结束。

① C. H. Whit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286—287.

② Stephanie Wes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ext*, see *A Commentary of Homer's Odyss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0.

我们如若套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来说明这部英雄史诗迄今的命运历程,仅仅从名称上说亦不为无当,因为人们往往喜欢把这两部歌颂英雄的作品相提并论。荷马史诗研究的前三个时期可以视为第一乐章“灿烂的快板”,是荷马史诗的“奏鸣曲”,三个时期刚好分别对应于这种曲式的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第四阶段可算作荷马史诗研究的“第二乐章”,从这个阶段荷马史诗研究的态势、取向和结果来看,无疑可以称为“送葬进行曲”。二十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崛起,学者们习惯于用一些莫名其妙的理论来研究荷马史诗,看起来十分搞笑,勉强可对应于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第三乐章“诙谐曲”。当然,荷马史诗永远不会有“终曲”。

一、古典时期

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个对荷马史诗提出批评的是比荷马大约晚半个世纪的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尽管他的矛头也许不是直接指向荷马,但他的新主张却为西方文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赫西俄德大力宣扬土地的道德以对抗荷马史诗的海洋伦理,用男耕女织的宁静生活来对抗荷马笔下打打杀杀、血流成河的生活。他的《工作与时日》是对荷马史诗所宣扬的尚武精神的批判,而他的《神谱》则是对荷马史诗极不严肃的“生活宗教”的纠正。成书于纪元后的《荷马与赫西俄德的竞赛》(*Agon Homeri et Hesiodi*)就记载着数百年后的人们对赫西俄德与荷马之间这种思想差异的理解。^①后来,品达(Pindar)则把荷马史诗中死伤遍野的战场变成了只赌输赢、不博性命的体育竞技场,从而使得“英雄”的概念有了更“文明”的内涵。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则以荷马史诗为题材写了一大堆剧本,明目张胆同荷马对着干:海伦并没有去特洛亚,神明们把这位旷古名

^① 中文由吴雅凌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上海:《经典与解释 3:康德与启蒙》,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媛吹到了埃及,只把海伦的魂影送到了特洛亚。如此一来,千古流芳的英雄们不过是在为一种幻影而殊死搏斗了十年,这是对特洛亚战争的辛辣讽刺,同时也是对荷马史诗的深刻批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已不仅仅是讽刺,而变成了一种深深的悲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荷马史诗也有相似的评论,要之,即在于“德性”(如“勇敢”)、“卓越”和“幸福”等社会基本观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哲学家对荷马史诗的批评中。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和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都批评荷马把如此下作不堪的东西,如奸淫、欺诈和盗窃,写在了神明身上,简直是亵渎神灵,赫拉克利特不仅要号召人们把荷马赶出赛会,并且煽动人们对其施以“鞭刑”。

柏拉图身兼哲人和诗人两重身份,他对荷马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在《伊翁》和《王制》(旧译“理想国”)等书中对荷马的批评,堪称诗与哲学之争的典范。柏拉图批评荷马糊涂,得罪神明而瞎眼(《斐德若》243a),说诗人是对摹仿进行摹仿,无法成为立法者之类的国家栋梁(《王制》,卷十)。但深入的分析却能显示出柏拉图的“微言大义”来,他表面上主张要把诗人赶出城邦,其实却是一番好意,“把诗人驱逐出去,只是为了把他们转变成城邦的缔造者”(伯纳德特语),更何况“柏拉图反对的主要是诗人而非诗”(施勒格尔语)。因此,柏拉图对荷马的批评最能体现“批评”这个词的深刻含意:“柏拉图对荷马名为抨击,实为赞扬”。^① 柏拉图毕竟把荷马称为“最伟大和最神圣的诗人”(《伊翁》530b10)和“希腊的教育者”(《王制》606e2)。

总之,从荷马史诗诞生的那一天起,它的宏大结构、细腻描写和繁复场景就摆在了世人的面前,它的高雅、博闻和深刻就“呈示”给了古希腊那些伟大的心灵。荷马同他所滋养的那些诗人、哲人、史家、喜剧家、悲剧家和政治家一起,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希腊文化,筑起了

^① 芬利主编、张强等译,《希腊的遗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页。

缪斯的祭坛和居所,也修成了人类精神的“家园”(黑格尔语)。在这个阶段中,荷马所创造的人神意象,对世界的理解,对社会的看法,以及高超的诗学艺术,对希腊的文化精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后来者一方面浸润在荷马史诗这座不竭的甘泉中,一方面不断同荷马对话和角力,以这种最“荷马”的方式继承荷马的遗产。从总体上说,古希腊之能够达到让人“言必称希腊”的高度,就在于希腊高贤之间不断展开心灵的对话。这种文明传承的方式与我们“祖述尧舜”的守成路线刚好相反,但在殊途同归中都达到了相同的思想高度,成就了文明的古老源头。从荷马对希腊文明的滋养中,我们最真切地看到了“批评”的力量。

二、中古时期

荷马史诗在这个阶段经历了由盛而衰最终近于湮灭的漫长历程,其主要贡献在于荷马史诗的编纂(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师徒三代人辛勤考订的结晶)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在音韵、文辞、目录等方面的悉心梳理,如果说古典时期人们的兴趣在于荷马史诗的“义理”,那么这个时期的功夫主要体现在“小学”上,究其原因和实质,便在于“两希文明的冲突”。

罗马文学本身就是从模仿荷马史诗开始的,因此整个罗马时期的批评家们对荷马的态度几乎都是肯定性的。维吉尔(Virgil)那部彪炳史册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就“充分利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仅改写了其中的场景,呼应了它们的景象,而且利用了两诗的主要情节”,^①即把奥德修斯的历险改写成埃涅阿斯从特洛伊战火中逃出来后的经历,把《伊利亚特》的战争改写成埃涅阿斯建立罗马的

^① 格里芬,《维吉尔》,见詹金斯编,《罗马的遗产》,晏绍祥、吴舒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51页。维吉尔的《农事诗》是在摹仿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他的《牧歌》也是在摹仿晚期希腊诗人的风格(参同一著作,第149—150页)。

斗争。

西塞罗(Cicero)、贺拉斯(Horace)、朗吉努斯(Longinus)、路吉阿诺斯(Lucian,旧译“琉善”)和普鲁塔克(Plutarch)等人虽然对荷马偶有微词(比如贺拉斯《诗艺》对荷马所谓“败笔”的批评,至今也为学界看重),但更多地却是倾心的向往,西塞罗的《图斯卡鲁论辩录》(*Tusculan disputations*)和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对荷马的高度评价,堪称荷马批评史上的杰作。

基督教上升为国教后,两希(即希腊—希伯来)冲突愈演愈烈,荷马史诗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受影响,成了教父们猛烈攻击的对象。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劝勉希腊人》就从宗教和道德的角度深刻地挖掘和严厉地批评了荷马史诗,最后得出“宙斯死了”的结论,比尼采“上帝死了”这一发现早了1600多年。在克莱门看来,荷马史诗宣扬的是赤裸的暴力和血腥的杀戮,而其宗教主张则更是诲淫诲盗。^①后来德尔图良(Tertullian)以及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I)的批评,则从政治上对荷马的命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甚至有教皇禁止神职人员阅读荷马史诗。

不过,在基督教的口诛笔伐声中,作为高级神职人员的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卒于1194年)却极力为荷马史诗辩护。尤斯塔修斯在荷马史诗研究方面深受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影响,写下了卷帙颇丰的荷马史诗评注,对后人的荷马史诗研究影响深远。他极为崇拜荷马,说像塞壬一样的荷马乃是万泉之源,荷马史诗中到处都是美好、纯真(即“无罪”)的东西,引人向上,励人高贵。尤斯塔修斯认为荷马虽然使用了“不真实”的神话,但已经人性化地处理了神话,而荷马之所以运用神话,其实也是一种智慧的计策,“这种诡计是要用神话的表皮之相作诱饵,吸引那些害怕深奥哲学的人,直到把这种人收入网中。荷马然后会让他们尝到真理的甜头,再把他们放开,让他

① 克莱门,《劝勉希腊人》,王来法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45—46页,53页。

们像聪明人那样走自己的路,在其他地方去获取真理”。^① 尤斯塔修斯这番巧妙的溢美,为两希文明搭起了一座桥梁。

就在基督教的高压之下,荷马史诗在新柏拉图主义阵营内却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在雅典学园这个苟延残喘的希腊古典学的最后堡垒中,普罗克洛(Proclus, 410—485)对荷马史诗及其评注的保存和整理可谓鞠躬尽瘁、居功至伟。他诠释柏拉图、研究赫西俄德、评注奥尔弗斯,整体性地评论荷马史诗,编写古代英雄传说手册,而且自己还摹仿古人写颂诗。普罗克洛对荷马史诗的改写、概述和批注,是后来荷马史诗研究的重要文献,几乎所有的专业研究者都会大量引用他的丰硕成果。

新柏拉图主义者是以语文学为手段,暗地里对抗基督教的文教理念,因此繁荣的荷马史诗研究“无非是同基督教交锋”。^② 这帮古典学的遗老遗少大都在同基督教对着干,但又无权无势,只好龟缩在语文学、史诗和柏拉图思想这块“寓言和哲学的领地”里,深文避祸,用心良苦。荷马史诗成了寄托聪明才智的对象,更成了思想斗争的利器,虽然大受打压,倒也因祸得福,至少在文献目录等“小学”方面更成系统。不过,中古时期后半段的荷马研究已处于停顿和瘫痪状态,甚至在文艺复兴以前,欧洲人已经不认识希腊语这种曲里拐弯的文字,遑论研究与批评了。

三、近代时期

近代的文艺复兴首先是“文艺”的复兴,而作为“文艺女神”的仆仆,荷马与荷马史诗自是当仁不让。古希腊文化成了近代思想的灵魂,人们把最美好的语词献给了那个遥远而神秘的时代,用最瑰丽的

① See Dennis Poupard (et al. eds.), *Classical and Medieval Literature Criticism*,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8, p. 275.

② T. W. Allen, *Homer: The Origi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4, pp. 53—55.

意境构筑起无比甜美的想象。在雪莱、济慈和歌德等人的热情讴歌中,希腊罗马文学成了文艺复兴的支柱,荷马史诗则起着主宰作用。这段时期人们对荷马的赞美远远超过古罗马,而对荷马史诗的翻译和模仿,则更是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来者)。

查普曼(G. Chapman, 1559—1634)和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等人精妙的翻译,本身就是逐字逐句对荷马史诗的理解和注解,这种外来文明的翻译对本民族的语言、“心智气候”乃至“时代”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中世纪欧洲各民族史诗的余荫下,才涌现出了大量的史诗作品。塔索(T. Tasso, 1544—1595)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Gerusalemme Liberata*),斯宾塞(E. Spencer, 1552—1599)的《仙后》(*Faerie Queene*),克洛普施托克(F. Klopstock, 1724—1803)的《救世主》(*Messias*)等,均有荷马史诗的痕迹。而近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弥尔顿(1608—1674)的《失乐园》(1667),则直接上承荷马,同时兼收并蓄了维吉尔、十六世纪意大利作家和英国的斯宾塞等人的诗学艺术。弥尔顿的目标是要调解历代对特洛伊战争的看法,他的理想就是要身兼荷马和维吉尔两人的长处。弥尔顿摹仿荷马史诗,结果就在史诗方面把从维吉尔到斯宾塞的诗人联成了一个前后一贯的整体。

这段时期的荷马研究所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诗论”,学者们深入研究荷马、贺拉斯和亚里士多德,尤其是在对荷马与维吉尔的比较中,发展了一种最初的独立的现代诗学理论。如维达(Vida, 1489—1566)所著《诗学》(*poetica*, 1527),意大利的斯卡利杰(J. C. Scaliger, 1484—1558)所著《诗学》,法国的德普雷奥(N. Boileau-Despréaux, 1636—1711)所著《诗艺》(*L'Art poétique*, 1674),德国的戈特舍德(J. C. Gottsched, 1700—1766)所著《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1730)等等,在荷马等古代诗人的滋养下,为各自的国家开辟了现代诗学理论的新路子。后来赫尔德、莱辛、歌德、席勒、洪堡特(W. von Humboldt)和施莱格尔(F. Schlegel)等人更为成熟的诗论,即由此而来,同时也是他们更深入地研究古典文学的结果。

在这段时期的后半段,即十八世纪中后叶,人们开始用历史学和语文学的方法来研究荷马史诗,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也为现代人热衷的“荷马问题”奠定了基础,或者说产生了“荷马问题”的雏形。比如布莱克维尔(Thomas Blackwell)的《荷马生平著作考》(1735),伍德(Robert Wood)的《论荷马的原创天才》(1769),以及奥比奈克(Abbé d'Aubignac)的《学术猜想或论“伊利亚特”》(*Conjectures académiques ou Dissertation sur l'Iliade*, 1715)等,甚至包括莱辛的《拉奥孔》(*Laocoön*),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寻找“历史的”荷马打开了方便之门,种下了现代“荷马问题”的病根。

四、现代时期

沃尔夫 1795 年发表的《荷马史诗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一文打开了荷马史诗研究的“现代”之门,同时它引起了现代人津津乐道的“荷马问题”,差不多也就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各种“主义”瘟疫和“学科”疾病肆虐着荷马史诗的肌体。歌德在其《格言与反思》(*Maximen und Reflexionen*)中呼吁:“愿希腊罗马文学的学习永远保留其最高文化之基础的地位”,据说就是要“捍卫严格的古典主义,以防现代主义的颠覆”。^①只可惜这种金玉良言被文艺复兴浇铸而成的“现代性”列车轧得粉碎。

现代荷马批评主要集中在“荷马问题”的名目之下。所谓“荷马问题”,主要指历史上是否真有荷马其人,荷马史诗出自一人之手还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荷马史诗成于一时一地还是层层累积而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否为同一人所作,两部史诗的关系等等。“荷马问题”的本质便在于要用“理性”(和历史)这根鞭子拷问荷马的“真伪”——这正是启蒙运动的家法,也难怪在“荷马问题”之外,这个世纪还诞生了“苏格拉底问题”和“《圣经》问题”等现代性特有的批评

① 贝西埃等编,《诗学史》,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上册,第438页。

目标。

历史意识的觉醒、语文学地位的上升以及现代学科的崛起共同成就了“荷马问题”，而沃尔夫的令名则主要依凭语文学这个现代性的最初法宝。他坦言，他的研究“不是利用荷马及其古代评注者的权威，而是所有历史的证据”，于是他批评“古代大面积缺乏历史意识”。从他的历史主义出发，荷马史诗似乎就成了“陈芝麻烂谷子”，“与诺亚方舟的故事是孪生姐妹”。^① 就在这种极度膨胀的历史意识中，荷马史诗的神圣性被彻底消解，被还原成连“断烂朝报”都不如的道听途说，变成不合格的历史著作。

“荷马问题”从业者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所谓的“原本”(ur-text)说，由于我们找不到荷马史诗的“原本”，因此荷马史诗的真伪就颇成问题。沃尔夫的《荷马史诗导论》有一个长长的副标题“关于荷马著作原来的和真实的形式和它们各种各样的变化以及恰当的校订方法”，其追求目标显然就是荷马史诗“原来的和真实的形式”，如果找不到这种形式，则荷马史诗显然出自多人之手，应该是历代史诗系列的汇总，而不是“荷马”史诗。沃尔夫利用当时颇为流行的魏格纳—赫顿“大陆漂移假说”来解释荷马史诗，只不过是反其意而用之。在这种理论看来，荷马史诗既不是荷马的“原创”，后来又历经修订，早已面目全非，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荷马史诗”了。

沃尔夫认为荷马史诗所描写的世界中不存在绘画，更不存在“书写”。既然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书籍’无影，‘写作’无踪，‘阅读’无痕，‘文字’无迹”，^②那么既不存在我们所谓的“荷马史诗”，也不存在一个写作特洛亚史诗的“荷马”。在沃尔夫看来，“荷马”不是一个专名，而是一个集合名词，包含了许多颂诗人在内，代表着一个天才辈出、才华横溢的黄金时代。退而言之，即便“荷马”曾是一个

① F. A. Wolf. Prolegomena to Homer, see I. J. F. de Jong (ed.), *Homer: Critical Assessments*. London: Routledge, 1999, V. 1, pp. 23-24.

② 同上, pp. 26-27.

活生生的人,但我们对他也知之不多,而仅仅知道,他并没有在任何完整的意义上写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算“荷马”不是一个空名,最安全的做法也至多把他看作是“荷马之子”所供奉的祖师爷而已,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当不得真。^①

如果说此前的新古典主义在荷马史诗的研究中最早偏离了正确的即古典学的航道,而布莱克维尔和伍德等人的研究继而连新古典主义中一息尚存的古典命脉也断送得干干净净,那么,由沃尔夫肇始的“荷马问题”则无疑将荷马史诗直接送上了现代性的“革命断头台”。在沃尔夫那里,荷马史诗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古代是否存在写作技术的问题,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学者们可以为所欲为地处理西方文化的“圣经”,他们想用什么办法、什么理论、什么水平、什么趣味来研究荷马史诗都可以。就在这种“怎么都行”的自由平等多元方法中,人们对写作模式、编纂过程和历史考古的兴趣急速升温,最终忘记了荷马史诗本身。“荷马问题”大行其道,不是荷马史诗本身的福气,而是语文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论的胜利:“方法论”在现代的极度膨胀,以及形式对内容的绝对优势,正是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思想贫乏的病根所在。

沃尔夫的理论在德国学术界成为主流,后来者变本加厉对荷马史诗横加切割。这种现代特有的研究模式从德国扩散到英法等国,渐始泛滥而不可收拾。但就在这派理论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仍有一些痴心的荷马迷坚守道统,从古典意义上认信荷马史诗。这后一派虽然势单力薄,但随着人们对“现代性”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人们慢慢觉察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弊端,开始同情并加入到后一派来。两派人士在思想的碰撞中,逐渐看清了问题之所在,于是开始互相借鉴、相互妥协、各自收敛,最后走向合流,“荷马问题”也随之淡出人们的视野,消弭在人们的觉悟中。

① Gilbert Murray, *The Rise of the Greek Ep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p. 238.

(一) 分解派

在学术史上,以沃尔夫为宗主的主流意见认为荷马史诗出自多人之手,于是他们开始对荷马史诗的内容和结构进行“分解”(Analysis),故而被称为“分解派”(Analyst)。这一派又可分为两种主要的学说,即“短歌说”(lay-theory)和“核心说”(kernel theory 或 nucleus-theory)。(1)持“短歌说”的学者或者认为荷马史诗由许多各自独立的片断缝合而成,比如拉赫曼(Lachmann)就认为《伊利亚特》像德国史诗《尼伯龙人之歌》一样,由十八首古老的短歌组成,或者认为《奥德赛》由“特勒马科亚”(Telemacheia,意即“特勒马科斯之歌”)和“尼基亚”(Nykia,意即“鬼魂篇”)等四五首独立的史诗拼凑得来。(2)持“核心说”的大部分学者认为“荷马史诗”虽确有其实,但比现在我们看到的短得多,最早的荷马史诗只不过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核心部分,后来者在此基础上不断添加、修订、删改,最终才形成今本荷马史诗的这般模样。在他们看来,“阿喀琉斯纪”(Achilleid,意即“阿喀琉斯之歌”)是《伊利亚特》的核心,其余故事为后人所加;“奥德赛”(意即“奥德修斯之歌”)是《奥德赛》的核心,“特勒马科亚”和“尼基亚”则是他人所作。

(二) 整一派

就在分解派一统江山的局面下,传统的“整一”思想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而是中流砥柱般地顽强地捍卫着荷马史诗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被学术界称为“整一派”(Unitarian 或 Unitarianism)。他们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坚决抵制当代人对荷马史诗鲁莽的修剪和拆毁,主张对现代人的历史消毒工作进行再消毒。这派“保守”之士坚信“大一统”(monolithic)的荷马,认信荷马的最高诗才,他们不相信冷冰冰的逻辑,反对用分析来亵渎,主张“心传”。

早期的整一派批评荷马问题的始作俑者、德国的大学者是书呆子和笨蛋,他们坚持荷马的“原创性”,甚至不惜犯“极端武断”的错